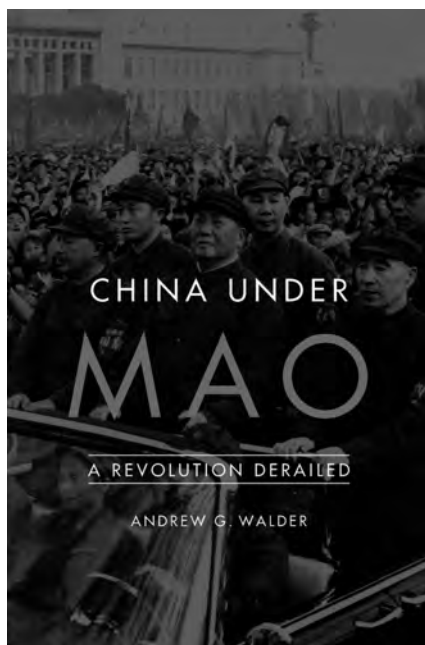


社會學視域中的毛時代

——評 Andrew G. Walder,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 董國強

在《毛澤東治下的中國：一場脫軌的革命》一書中，魏昂德設定的目標是寫一部在觀念和內容方面全面推陳出新的通史性讀物。他十分清醒地意識到，這樣的著作離不開對近三十年來國內外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借鑒和引證。



Andrew G. Walder,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015年4月，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教授的新書《毛澤東治下的中國：一場脫軌的革命》(*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引用只註頁碼)。這距離該出版社上次推出他的著作《斷裂的造反：北京的紅衛兵運動》(*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①時隔六年。魏昂德是一位國際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長期致力研究共產主義政權及其後繼國家中引發衝突、維持穩定和導致變革的各種因素。他的中國研究論著，涵蓋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經濟組織形態和後毛時代的社會分層、社會流動和政治衝突。

筆者與魏昂德的密切交往，始於2008至2009年在斯坦福大學人文研究中心擔任駐所研究員期間，從此開啟了我們的合作研究之旅。迄今為止，我們已經聯名在國際權威學術刊物上發表了六篇論文，系統追蹤江蘇/南京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來龍去脈^②。這種合作研究經歷，使筆者對魏昂德的文革研究理念和方法有相當深入的了解。但對於他關於當代中國的社會學研究成果，筆者一直知之甚少，所以在

收到這部關於當代中國的通史性新作時，內心充滿了好奇和期待，希望藉此進一步了解他的個人學術經歷和思想。

事實上，在該書正式出版之前，西方的中國當代史研究圈內一些知名專家已經閱讀過全部或部分書稿。瑞典隆德大學教授沈邁克 (Michael Schoenhals) 認為：「這是一位長期致力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研究的傑出美國歷史社會學家的深具洞察力的學術研究成果。」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白思鼎 (Thomas P. Bernstein) 認為：「本書是學界眾多關於毛澤東中國的研究成果以及魏昂德本人十分廣泛的社會學研究成果的一個精妙老道的總結。」(封底) 在認真通讀全書以後，筆者獲得的整體印象與上述專家的看法高度吻合。該書確實有許多值得稱道之處。本文將就該書的整體布局和內容側重、獨特的歷史敘事方式、理論框架和核心觀點、主要結論以及全書的不足與缺憾作出討論。

一 文革研究的階段性總結

魏昂德自我設定的目標，是寫一部在觀念和內容方面全面推陳出新的通史性讀物。他十分清醒地意識到，這樣的著作離不開對眾多同行專家研究成果 (尤其是近三十年來國內外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的借鑒和引證。他謙遜地在〈前言〉中向許多學界同仁表達了敬意和謝忱 (頁 xiii)。從書末羅列的參考文獻 (頁 377-98) 可以看出，作

者參考和引證的著作主要來自兩方面：

第一，老一輩學者近年推出的新著，如馬若德 (Roderick MacFarquhar，又譯麥克法夸爾) 與沈邁克合著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 (*Mao's Last Revolution*)，泰偉斯 (Frederick C. Teiwes) 與孫萬國合著的《中國通往災難之路》 (*China's Road to Disaster*)、《毛主義時代的終結》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等。

第二，中生代和新生代學者的著作，如陳佩華等人的《陳村：一個毛時代中國農民社區的歷史》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等人的《無產階級權力：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上海》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福斯特 (Keith Forster) 的《一個中國省份的造反和派性鬥爭：浙江，1966-1976》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王紹光的《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潘佐夫 (Alexander V. Pantsov) 的《毛澤東：真實的故事》 (*Mao: The Real Story*)，馮客 (Frank Dikötter) 的《毛的大饑荒》 (*Mao's Great Famine*)、《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的一段歷史》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9-57*) 等。

此外，老一輩學者的一些經典作品，如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 關於中國革命和毛澤東的研究，

毛時代發生的許多事件，不過是中共統治頭十年中建立起來的制度建構的外在表現。因而在講述毛時代的故事時，作者腦海中揮之不去的乃是這些制度建構。

雖然鳴放一反右運動、大躍進和文革是相繼發生的三個相對獨立的歷史事件，具體的起因、進程和後果不盡相同，但是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建設孕育的一些結構性問題卻是前後貫通的。

塞爾登 (Mark Selden) 關於延安道路的研究，懷特 (Martin K. Whyte) 關於中國社會組織和政治禮儀的研究等，則在該書第二、三章敘述當代中國歷史的前史時略有徵引。

以上這些著作間接反映了本書的內容側重。儘管魏昂德在書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毛時代中國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是：(1) 1957年前後的鳴放一反右運動；(2) 1958年前後的大躍進與大饑荒；(3) 1966年爆發且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然而在全書三百四十多頁的正文中，有近一半篇幅（從頁 180 開始）聚焦於文革的論述。從全書十四章的內容看，第一章帶有引言性質，概要地介紹了本書的問題意識、核心觀點和後面各章節的內容要點；第二至四章概述了中共成立以後的鬥爭歷程和貫穿 1950 年代的中國城鄉社會改造；第五章詳細論述了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形態及其結構性缺陷；第六章深入論述了 1950 年代中共的政治角色轉換、組織結構與形態、黨員社會構成與分層、黨員精神狀態 (mentality) 和幹部獎懲機制；第七章主要談鳴放一反右運動；第八章主要談大躍進及其後果；第九至十三章則深入探討文革的方方面面；第十四章是對毛時代的整體評價。

對這種看來不成比例的篇幅格局，我們似乎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去理解：首先，作為一位社會學家，與一般歷史學家更加關注歷史事件的線性發展不同，魏昂德似乎更加關注歷史事件背後的結構性問題。他在〈前言〉中提到，儘管本書的很多內容是以敘述的方式呈現出

來，但這些歷史敘事的深層驅動卻是社會學關注的問題。毛時代發生的許多事件，不過是中共統治頭十年中建立起來的制度建構的外在表現。因而在講述毛時代的故事時，作者腦海中揮之不去的乃是這些制度建構（頁 xii）。從這個認知出發，雖然鳴放一反右運動、大躍進和文革是相繼發生的三個相對獨立的歷史事件，具體的起因、進程和後果不盡相同，但是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建設孕育的一些結構性問題卻是前後貫通的。事實上，魏昂德在不同章節重點論述某一個運動時，總是會提及它與其他兩個運動之間的相互關聯和結構上的相似性，在內容敘述上也有一些交叉和重疊的地方。

其次，這三個運動的持續時間和社會影響，呈現出一種逐步遞進的態勢。鳴放一反右運動不到三年時間，在這場運動中遭受打擊迫害的主要是知識份子群體；大躍進和其後的大饑荒加起來大約有四五年時間，其社會危害雖然遍及全國城鄉，但由於最高當局採取放棄農村、保護城市的政治策略，所以命運最慘烈的主要是農民群體，大饑荒中餓死的三千萬人也主要來自農村；而文革從正式爆發到宣告結束整整持續了十年，期間社會動亂遍布全國城鄉，社會成員無不受到運動波及，黨政幹部群體在運動初期首當其衝遭受迫害，學生、工人和其他社會群體在奉旨造反後不久遭到當局殘酷鎮壓，數百萬基層幹部群眾在群眾派性武鬥和當局主導的政治整肅中死於非命。運動的多次反覆造成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社

會氛圍，對中國社會的破壞程度可謂空前絕後。

再者，從學界的研究現狀看，以上三大運動當然都具有深入研究的價值和必要，但相對而言，前兩個運動的研究已經比較深入，學界在一些主要問題上也有比較一致的共識。但文革的研究則不可同日而語，由於中國當局長期以來竭力限制對文革的研究，各級檔案館收藏的1966年以後的檔案資料至今不對研究者開放，所以關於這場運動的許多問題仍然撲朔迷離。例如文革初期群眾運動與高層精英政治的互動關係，1968年春「大聯合」前後當局對群眾組織的武力鎮壓和對造反派頭頭的無情清洗，「林彪事件」的起因、內情和性質，文革後期的「批林批孔」運動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所涉及的高層政治鬥爭，以及文革中後期一般民眾政治態度的微妙變化等等，我們（包括很多文革運動親歷者）迄今為止還知之甚少。

當下人們對文革運動的理解和闡釋，還大多基於主流媒體的輿論宣傳和較為感性、直觀的個人體驗。這種狀況使得不少嚴重違背歷史真實的文革敘事謬種流傳，嚴重誤導了一些年輕人和外國人，間接導致新專制主義、狹隘民族主義、大國沙文主義、民粹主義和領袖個人崇拜等惡劣政治傾向在當下中國的社會輿論中甚囂塵上。因此，如何突破迷霧、追根溯源，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客觀再現文革的真實景象，釐清當時矛盾衝突的基本線索，揭示這場動亂的複雜成因和嚴重後果，從中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不

但深具學術價值，而且饒富現實意義。

值得慶幸的是，儘管文革研究面臨重重困難，但依然有不少中外學者鍥而不捨，默默耕耘，在資料收集、整理和理論闡釋方面推陳出新，不斷產生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魏昂德本人就是一位傑出的文革研究專家。他在三十多年前發表的關於上海「一月革命」的研究、2009年發表的北京紅衛兵運動的研究，以及他和一些學生長期協作、蔚為大觀的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專題研究，都是文革研究歷史上的典範之作^③。此外，陳佩華等人關於廣東文革的研究，裴宜理等人關於上海文革的研究，王紹光關於武漢文革的研究，福斯特關於杭州文革的研究，以及董國強等人關於南京文革的研究^④等等，也是近三十年來文革研究領域的創新之作。

上述這些研究成果大多聚焦於省市一級及以下單位的運動形態及發展軌迹，考察對象包括學生、工人、農民、地方黨政幹部等群體、地方駐軍和其他社會群體，這與老一輩學者慣常採用的精英政治視角形成鮮明對照。單獨地看，這些研究成果都是微觀實證研究的產物，分別講述了不同的故事。但是將這些研究成果匯集在一起，便不難發現全國範圍內文革運動的一些結構性脈絡。魏昂德新書中關於文革的歷史敘事和理論闡釋，是對上述這些論著內容的重新審視、重新闡釋、提煉昇華的集大成嘗試，是對過去三十年文革研究的一個階段性總結。

本書關於文革的歷史敘事和理論闡釋，是對近三十年來文革研究論著內容的重新審視、重新闡釋、提煉昇華的集大成嘗試，是對過去三十年文革研究的一個階段性總結。

二 以結構分析引領歷史敘事

除了在內容上明顯偏重於文革時期之外，本書給筆者留下的另一個突出印象，是結構分析和歷史敘事相結合的獨特的歷史論述路徑。魏昂德認為，經歷1950年代社會主義改造以後的中國，是一個以一種獨特方式組織起來的社會。它既不同於西方國家，也不同於過去的中國。要理解為甚麼如此眾多的中國公民積極地投身當時的各種運動和發生各種衝突，我們必須理解當時人們（包括各級官員和普通群眾）生活與工作的社會環境和組織環境（頁 xii）。

基於上述認知，全書各章節的歷史敘事是圍繞社會的結構關係、而非個人的傳奇故事展開。因而在這部時段涵蓋三十多年的通史性著作中，作者提到的人名數量十分有限。這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歷史敘事的直觀性和生動性，但社會性的結構關係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複雜互動則顯得更加突出。此外，魏昂德很擅長利用散見於政府公文、統計年鑒、地方志資料和檔案文獻中的各種數據，他通過對這些數據的統計分析，向讀者呈現出一些在單純的歷史敘事中難得一見的社會面相。例如，本書第六章利用統計數據和圖表對1950年代新黨員家庭背景、知識水平和政治意識的分析和解說；第八章對大躍進的人口學含義、糧食生產與徵購情況、工業生產情況、國營工業職工情況的數據分析和解說；第十二章對文革期間暴力事件和「非正常死亡」

情況的統計分析與解說；第十四章利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國內生產的逐年變化、工業經濟增長趨勢、國營企業人均工資增長水平等數據以及基尼系數的國際橫向比較，作為評價毛時代中國經濟成就的客觀依據。這顯然比單純的歷史敘事和大而化之的理論分析更有說服力。

魏昂德還在〈前言〉中提到，他個人特別感興趣的研究課題是政治權威的基礎、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社會不平等、政治衝突以及民眾抗議（頁 xiii）。這種視角既是政治學的，也是社會學的。因而他更為關注的是全國範圍省市一級和一些重點單位內部的政治衝突，對北京高層的活動與鬥爭方面反而著墨不多^⑤。而在向讀者呈現全國範圍省市一級和社會基層的情況時，作者一般先有一個比較宏觀的結構性介紹和評說，然後再以若干典型個案去深化與彰顯那些比較突出的階段性特點。

例如在第十一章中，作者首先提到毛澤東基於錯誤的政治判斷，鼓動學生、工人等社會群體起來造反、奪權，卻沒有預見到地方黨政機構垮台以後，失控的群眾派性鬥爭會成為新的棘手問題；接踵而至的軍管措施不但無助於秩序重建，反而將群眾派性鬥爭推向新的高潮，連軍方自身也深陷派性政治的泥潭。隨後，他通過對南京、廣州、武漢、杭州、青海、四川、南寧等地派性鬥爭的描述與分析，揭示了中央政策導向的內在悖論以及地方政治衝突升級的必然性。又如，在第十三章中，作者首先概述

全書各章節的歷史敘事是圍繞社會的結構關係、而非個人的傳奇故事展開。魏昂德擅長利用散見於政府公文、統計年鑒、地方志資料和檔案文獻中的各種數據，向讀者呈現出一些在單純的歷史敘事中難得一見的社會面相。

「林彪事件」前後的政治發展，指出文革運動所造成的種種社會危害，隨後通過對杭州、南京、廣州、北京等地民眾抗議運動的描述與分析，揭示了北京高層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如何在地方上發生本質性的異化。這樣，我們不但可以了解高層的政治決策情況，同時可以了解這些政治決策的貫徹實施過程，以及其在社會基層的實際影響。這種點面結合的寫法，有助於克服一般通史性著作中宏大敘事的抽象空洞弊病，同時也有別於一般專題研究著作中「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偏向。

三 全書的理論框架與核心觀點

魏昂德在〈前言〉中開宗明義，指出理解當代中國歷史的重要前提是深入了解兩個極端重要的組織系統：(1) 共產黨的組織形態和機構設施；(2) 借鑒於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他認為這些政治和經濟的制度架構，是確保政治決策得以貫徹實行的重要前提和組織保障。大量歷史事實表明，中共依託這樣的制度架構取得了一些符合預期、令人驚嘆的成就。但與此同時，這樣的制度架構也導致了一些出乎意料和違背初衷的災難性後果。他要探究和解釋的主要問題是，為甚麼中共領導人(主要是毛澤東)的一些決定常常會帶來始料不及的災難性後果(頁 xi-xii)？

(一) 中共的組織紀律觀念

從上述問題意識出發，魏昂德在第二和第六章中對中共的鬥爭歷史和組織形態進行了系統深入的考察。他認為組織紀律觀念和全黨團結一致是中共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他還通過對延安整風運動的敘述與分析，解釋了「紀律」的具體內涵和政治效用。所謂「紀律」，就是要求廣大黨員和各級幹部對黨的領袖絕對忠誠和無條件服從。他強調「紀律」觀念表面看來是政治教化和道德灌輸的結果，實際上卻是高壓威懾和嚴厲懲罰的產物。在執行「紀律」的過程中，那些持有不同看法的人(以及被認為持有不同看法的人)，都會遭到懷疑和清洗；只有那些竭力表現忠誠、得到上級信任的人，才會被安置到各級領導崗位上。

1949年中共成為執政黨以後，儘管黨組織的規模不斷擴大，黨員的社會構成變得更加複雜，但戰爭年代留下的這份精神遺產繼續在現實生活中發生作用。由於社會上升通道單一化，所有試圖尋求個人發展的人都必須首先爭取到一張黨票，所以與戰時入黨的老黨員相比，新黨員的政治投機傾向和犬儒主義傾向更加明顯。此外，隨着現代國家職能的不斷強化，黨組織對黨員的監視和控制手段更加多樣和嚴密。這也有助於強化黨員的組織觀念和紀律約束，確保全黨上下團結一致。

但魏昂德在書中多次提到，高度的組織紀律觀念和全黨上下的高

魏昂德多次提到，高度的組織紀律觀念和全黨上下的高度一致是一把雙刃劍。這樣的黨員精神狀態和黨的組織形態意味着，黨在現實政治中的作用如何，完全取決於黨的領袖的判斷和決策能力。

本書的一個重要關注是「社會動員」。該概念常常與「批鬥大會」、「當眾羞辱」、「施暴」、「關押」、「草率處決」之類的字眼聯繫在一起。由此可見，至少在中國語境下，「社會動員」的本質是高壓威懾與暴力裹挾。

度一致是一把雙刃劍。這樣的黨員精神狀態和黨的組織形態意味着，黨在現實政治中的作用如何，完全取決於黨的領袖的判斷能力和決策能力。如果黨的領袖判斷決策失誤，那麼在黨內組織紀律性愈強、全黨上下的一致性愈強的情況下，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就愈嚴重；如果黨的領袖堅持錯誤的判斷決策，那麼災難性後果就會不斷延續和加劇。在魏昂德看來，各級幹部在歷次運動中的種種過激表現，主要不是個人因素造成的，而是黨的組織紀律約束和黨內倫理道德灌輸的結果。很多極端做法不是個人行為，而是組織行為。基於上述結構分析，他在談到中共的政治失敗時，始終將主要責任歸咎於黨的領袖毛澤東，各級黨政幹部充其量只是毛的盲目追隨者。

從書中的敘述不難看出，其實自土改運動開始，上述中共組織形態的弊端已經有所暴露。然而當時最高當局的應對辦法，是反覆不斷地對基層幹部進行整肅與清洗。這種做法的實質是將中央高層決策錯誤的責任轉嫁給具體執行政策的各級幹部，使領袖的超凡魅力神話得以延續。而這種做法能夠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奏效，一方面是因為在國家政治極端不透明的情況下，很多人（包括基層幹部）對中共高層情況和政治過程不甚了了，很容易受到宣傳輿論的忽悠；另一方面是因為基層幹部直接與普通民眾打交道，其暴行與特權更易於為民眾感知，且常常激起民憤。不過，從制度架構層面看，幹部特權是黨國體制的應有之義，是維護黨內團結和

領袖崇拜的重要手段。自下而上逐級遞升的權力和特權，使得廣大黨員趨之若鶩、孜孜以求，在很大程度上維繫着他們對組織和領袖的效忠。

但魏昂德在第六章中提醒我們，獲得特權和權力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儘管各級幹部在位時享有特權，但這些特權是職務的附屬，不是個人的法權。一旦失去上級的信任，失去擔任的職務，各種特權也就隨之喪失。而且，按照黨的組織紀律和道德倫理，一個人一旦入黨便沒有了個人選擇的自由，也不存在主動退出的可能。要麼絕對服從，盡忠職守，死而後已，或者被作為替罪羊踢出黨外；要麼提出並堅持個人觀點，被黨組織視為異類，遭到嚴厲處置；退黨和自殺都是不可饒恕的叛黨行為。由此可見，絕大部分黨員幹部之所以表現得如此冷酷無情，不是因為他們天生缺乏同情惻隱之心，而是因為他們承受不起失去組織信任的代價。這不但意味着個人的悲慘命運，而且會殃及其家人、親友和上下級同僚。

上述組織形態和黨員的精神狀態，在中共成為執政黨以後——尤其是在1950年代的城鄉改造運動中——對整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形成毛時代中國政治的社會基礎。本書的一個重要關注是「社會動員」。社會學和政治學中「社會動員」概念的具體內涵是甚麼，筆者不甚了了，但是在本書的敘述中，「社會動員」概念常常與「批鬥大會」、「當眾羞辱」、「施暴」、「關押」、「草率處決」之類的字眼聯繫

在一起。由此可見，至少在中國語境下，「社會動員」的本質是高壓威懾與暴力裹挾。

(二) 計劃經濟體制

在本書第五章中，魏昂德用大量篇幅以國際比較視野具體論述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作者首先分析了蘇聯戰時經濟的特點和成就。他認為經濟基礎落後的蘇聯能夠與經濟基礎先進的德國抗衡，並最終將其打敗，是蘇聯經濟模式得到一些人認同的重要依據之一。不過，他同時指出，從更長時段的發展情況看，尤其是與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相比，蘇聯經濟模式的結構性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其主要問題包括：基於主觀意願的經濟發展計劃嚴重脫離客觀存在的現實條件，對價值規律的漠視導致經營管理粗放，經濟效益低下，工業產品質次價高，對資金和資源的浪費非常嚴重。計劃經濟模式下GDP總量的迅速增加，是以犧牲經濟效益和巨量資源浪費為代價的。從本書對蘇聯戰時經濟的敘述和中國模仿蘇聯經濟體制的具體實踐看，計劃經濟的強項不是刺激生產的能力，而是攫取資源的能力，因而這種經濟形態最終必然難以為繼。

魏昂德還提到，鑒於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種種弊端，蘇聯和東歐各國不得不在1950年代施行改革。蘇聯的做法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中加入一些現代科學管理技術手段，將一部分經濟管理權力讓渡給專業人員和技術官僚，實行黨領導體制下的專家治國路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則在計劃經濟體制中引入市場競

爭機制和物質刺激手段，即在國家壟斷經濟基本格局不變的前提下，讓國有企業按照市場規律組織生產。但毛澤東固於從《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學到的若干概念和簡單僵化的理解，十分反感蘇東各國的改革舉措，並斥之為「修正主義」。他把蘇聯戰時經濟模式和中共戰時社會動員實踐理想化、絕對化，主張通過書記掛帥、社會動員、厲行節約、倡導幹部群眾自我奉獻等辦法克服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促進經濟快速發展。這種想法的貫徹落實，使得黨對社會的控制進一步加強，也使得「外行領導內行」成為中國特色發展道路的突出標識，其嚴重後果是將計劃經濟體制的各種固有弊端發展到極致。

從表面上看，計劃經濟體制主要涉及經濟發展方式和工農業生產管理。但在現實生活中，計劃經濟體制還廣泛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並進而影響到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魏昂德在這個方面也有一些分析和論述。例如，他指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社會福利都是由「單位」提供的，這必然導致社會成員對「單位」的人身依附。他還指出，由於資源的有限和生產能力的低下，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不得不在消費端實施限制，而等級差序和特權差序是計劃配給制度的一個突出特徵(頁91-97)。由此可見，所謂社會主義制度下人人平等，不過是主流輿論宣傳製造的一個政治神話。

在魏昂德看來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毛澤東本人似乎對官僚體制建構具有一種天生的反感。然而無所不在的黨組織和無孔不入的計劃經

在魏昂德看來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毛澤東本人似乎對官僚體制建構具有一種天生的反感。然而無所不在的黨組織和無孔不入的計劃經濟，本身就構成兩大規模空前的官僚體制系統。

本書深入檢討全黨高度一致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消極後果。基於高壓威懾和暴力裹挾的「統一思想」、「統一行動」，使得中共黨內和整個中國社會無由產生抵制錯誤政策的體制性健康力量。

濟，本身就構成兩大規模空前的官僚體制系統。毛澤東為防止技術官僚和管理精英操控經濟，於是把掌控經濟的權力全部集中到中共幹部手中。這使原本平行的兩大官僚系統融為一體，客觀上大大強化和固化了原有的官僚體制建構，官僚體制的積弊也有增無已。誠如魏昂德所指：「在這一歷史時期，在一種以十分獨特的方式組織起來的社會形態和經濟形態中，領導人的決定經由一種特定的政治組織系統被轉化為行動。來自最高當局的命令通過一個龐大的覆蓋全國的官僚體系和一種新的社會制度架構逐級傳遞，期間最高當局的意圖常常會因一些無法遇見的因素遭到闡割、歪曲或誇大。」（頁 xii）。

魏昂德還在第八章「大躍進」中，在「官僚政治的自我欺騙怪圈」和「官僚政治的壓制怪圈」子目下，較為詳細地論述了各級幹部如何為了迎合毛澤東而競相提出各種根本無法實現的目標，又如何為了躲避責罰而千方百計地阻止各地災情上達中央。毫無疑問，這種刻意的謊報、瞞報，肯定不是毛澤東所期望的，但這種行為又是前述的組織紀律觀念和高壓政治氛圍的必然產物。

魏昂德關於兩大組織系統的結構形態和運作機理的分析論述，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刻揭示了為甚麼毛澤東會常常生發出一種徹底破除官僚體制的內心衝動，但又始終無法徹底擺脫官僚體制的羈絆。

綜上所述，本書的基本理論架構就是採用逆向思維的方法，深入

檢討全黨高度一致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消極後果。概而言之，基於高壓威懾和暴力裹挾的「統一思想」、「統一行動」，使得中共黨內和整個中國社會無由產生抵制錯誤政策的體制性健康力量。客觀地看，關於集權政治和計劃經濟的弊端以及這兩者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在理論上並不是一個很新的話題。魏昂德的貢獻主要在於將一些得到廣泛認同的解釋體系與對中國實際情況的精細考察結合起來，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更加清晰有力地闡釋了那些已有的認知，同時也在很多方面豐富與發展了現有的認知體系。

四 幾個重要結論

由於毛時代中國實行黨國一體和中央集權體制，同時中共強調全黨對領袖的服從和崇拜，所以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無疑要對當代中國發展中的所有挫折和災難承擔責任。這是一種結構性的分析判斷，與個人品格和能力無關。即使黨的領袖不是毛澤東而是其他人，當代中國的基本發展軌迹也不會存在很大差異。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歷史，為這樣的判斷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不過，既然毛澤東在那段歷史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書當然不能不涉及他的表現和評價。魏昂德認為毛在中共黨內領袖地位和絕對權威的形成，一方面是延安整風期間毛及其政治盟友有意識地製造個人崇拜的結果，另一方面在中國革命進程中的幾個緊要關頭，毛確

實表現出精明的判斷和堅定的決心。而且在這些緊要關頭，毛的遠見卓識最初往往得不到應有的支持。他的意見最終成為黨內一致共識，是他固執己見、堅持不懈的結果（頁24-39）。因而，毛頭腦中固有的「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信念得到不斷強化。革命勝利以後，這種政治資本不幸地轉化為一種政治包袱。他的過份自信和黨內糾錯機制的缺失，使得許多錯誤決策無法得到及時糾正，最終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魏昂德沒有簡單地將毛澤東定義為「壞人」。在談到1949年以後的許多政治決策及其嚴重後果時，他頻繁地使用了「出乎意料的」、「無法預見的」、「違背其初衷的」之類的語彙（頁6、200、315、319）。不過在結論部分，魏昂德也精闢地分析毛的歷史局限性。他認為毛並非一位勇於嘗試、富於創見的思想家。恰恰相反，毛的思想極其狹隘，極其僵化，極其落伍。當中共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候，毛依然固守着自己早年形成的一些觀念和認知，主要包括四方面：

第一，他認為只有經過暴力衝突才能實現真正的社會變革和解放被壓迫者。對舊精英階層施以暴力和羞辱，是革命的應有之義；第二，他沿襲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的觀點，認定階級鬥爭貫穿於整個社會主義階段，甚至認為社會主義階段的階級鬥爭會更加激烈。他還認定不同的經濟政策主張和對社會改造速度的不同意見是階級鬥爭的表現；第三，他認為通過集

權和紀律手段維持全黨上下思想和行動的高度一致，是取得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不二法門。而實現思想和行動高度一致的途徑，是努力培植領袖個人崇拜；第四，他認定社會主義的基本要素是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所以頑固地拒斥市場經濟、物質刺激和私營企業，同時輕視科學技術和專業精英（頁336-39）。

魏昂德認為，正是基於上述僵化、狹隘的觀念和認知，毛澤東不但無視西方工業化國家的成功經驗，而且無法理解斯大林的晚年反思和蘇東各國的改革。這樣，他必然對當時面臨的許多現實問題做出錯誤的診斷，開列出足以致死的藥方。例如他把政治和經濟領域高度集權帶來的官僚體制弊端和特權腐敗認定為「資本主義復辟」，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無稽之談。當時中國的問題不是資本主義復辟，而是集權主義政治和官僚等級制度的積弊。在不觸及原有制度建構的前提下，試圖通過整肅幹部以保持官僚機構的純潔和效率，結果只會陷入周而復始的衝突與破壞。

魏昂德對毛時代中國的實際發展狀況給予的評價也令人警醒。他承認在縱向比較的評價體系中，中國取得的成就是不容否認的。這些成就不僅表現在一些量化指標上，如人口總死亡率、嬰兒死亡率、人均壽命、GDP增長速度和總量等，還表現在一些無法量化的指標上，如打擊有組織犯罪、禁止毒品交易、取締娼妓等社會改造工作的成功。不過在國際範圍橫向比較的評

魏昂德沒有簡單地將毛澤東定義為「壞人」。在談到1949年以後的許多政治決策及其嚴重後果時，他頻繁地使用了「出乎意料的」、「無法預見的」、「違背其初衷的」之類的語彙。不過他也認為毛的思想極其狹隘，僵化，落伍。

魏昂德對近年來「新左派」知識份子和中共領導層讚頌毛時代成就、重塑毛個人形象的努力提出批評。他指出對毛時代和毛澤東個人的美化，乃是基於高度選擇性的歷史記憶和對許多事情的有意遺忘。

價體系中，中國取得的那些成就便不免黯然失色、相形見绌，主要見於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儘管中國的GDP總量很大，但1950至1973年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人均GDP指標僅處於亞洲中等水平，略高於菲律賓、印尼和印度，遠遠落後於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泰國（頁321-22）。這些國家在1950年前後與中國處在同一起跑線上。

第二，中國的經濟增長很不穩定，在大躍進和文革時期甚至出現了劇烈的負增長。重工業投資比重過大，導致國民經濟整體上效益低下，投入/產出不成比例，同時造成各種資源的巨大耗費。高積累、低消費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中國人民的生活長期維持在一個很低的水平，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消費品、住房和各種社會服務嚴重不足。

第三，通過「社會主義國家」、「亞洲國家」（不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和「工業化國家」三個序列的基尼系數比較，魏昂德指出相比於絕大多數工業化國家，毛時代的中國可以看作一個平等的社會。但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中國是最不平等的國家。與亞洲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社會平等程度超過菲律賓、印尼和印度，與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接近，但與台灣有不小差距。

第四，中國農村的貧困狀況是毛主義失敗的最顯著表徵之一。統計數據顯示，截至1978年，近30%的農村人口（即2.37億人）生活水平低於中國政府規定的貧困標準，而中國政府規定的貧困標準低於國際機構制訂的標準^⑥。這種現實狀況

與經歷過「和平土改」的台灣、日本和韓國形成鮮明對照，說明中國農村的長期貧困主要是錯誤政策造成的。

第五，毛時代中國的人口損失巨大。魏昂德依據一些現有研究成果（如楊繼繩的《墓碑》、馮客的《毛的大饑荒》等），認定大躍進之後的大饑荒奪去了3,000萬生命（頁169、333）。按照人口比例看，這場大饑荒的嚴重程度與蘇聯1930年代的大饑荒難分仲伯。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持續八年的抗日戰爭的人口損失約為1,200萬人（其中包含200萬戰場傷亡和1943年河南大饑荒造成的400萬人死亡）^⑦。魏昂德還依據自己和其他學者的研究，認定建國初期的鎮反運動致死人數在100至200萬之間，文革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00至160萬之間（頁333-34）^⑧。

最後，魏昂德還對近年來「新左派」知識份子和中共領導層讚頌毛時代成就、重塑毛個人形象的努力提出批評。他指出對毛時代和毛澤東個人的美化，乃是基於高度選擇性的歷史記憶和對許多事情的有意遺忘，嚴重偏離了1970年代末中國社會的廣泛共識（頁341-44）。事實上到毛澤東去世時，他在1950年代後期希望達成的目標絕大部分還未實現。毛給中國留下的是一個因派性紛爭而四分五裂的黨組織和一個在十年浩劫中飽受攻擊、亟待恢復的政府。工業化進程處於停滯狀態，農村的貧困無所不在，城市生活水平長期沒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變得更糟，大學制度出現倒退，科學和技術落後於國際水平數十年（頁315）。正是基於對上述情

況的清醒認知和深刻反思，中國自1970年代末開啟了從毛澤東的錯誤領導所造成的巨大破壞中恢復元氣的漫長進程。

五 不足與缺憾

筆者認為本書確實堪稱一部有關當代中國歷史的創新之作。它以一種國際比較的理論視野和深入扎實的實證研究，令人信服地解釋了毛主義的歷史局限及其在中國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在理論框架和論述體例方面，也有許多值得歷史學家借鑒的地方。不過，該書同時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本書的參考文獻共涉及三百六十多種書籍和論文，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英文著述。作者引用的中文著述僅限於卜偉華、林蘊暉、沈志華關於當代中國史的研究專著（頁379、388、392），以及郭德宏等人關於社教運動的論著（頁384），朱地關於鳴放—反右運動的著述（頁398）和王力回憶錄等（頁395）。至於楊繼繩關於大饑荒的論著（頁397），嚴家其等人關於文革的論著（頁397），戴晴關於延安整風的著述（頁381），楊天石關於蔣介石的研究（頁397），楊奎松關於鎮反運動（頁397）以及王奇生關於中國抗戰的研究（頁395）等，則引自英譯本或英文學術論文集。上述文獻引用情況，固然反映了中國大陸相關研究的嚴重滯後以及國際影響的微弱，同時也說明作者對中國大陸學界的情況還缺乏足夠了解。就本書

各章內容看，筆者認為高華關於延安整風運動、于風政關於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朱正關於反右運動、張素華關於七千人大會、徐海亮關於武漢「七二〇事件」、吳迪（啟之）關於內蒙文革運動以及何蜀關於重慶文革運動等論著^⑩，應該引起作者的重視。這些著述可以為本書的敘述與分析提供更多的樣本和案例。

第二，魏昂德在〈前言〉中提到，這本書與他過去的許多著述相比，差別在於後者的對象主要是特定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因而，那些著述更強調作者的概念框架、資料的新穎性和分析範式的原創性，以及對各種替代性論述路徑的批判性討論。對於非專業人士而言，那樣的論著顯然是冗長乏味的。所以在這本書中，他嘗試以一種通俗易懂的方式來綜合自己關於毛時代中國歷史的認識。這樣，他不但可以與學界同仁和學生直接對話，而且可以讓其他人（非專業人士）藉此接近和理解那段歷史（頁xiii）。以筆者的個人閱讀體驗看，由於本書的理論關注、結構體例和言說方式等更多地源自社會學研究，使得它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歷史學論著，尤其是缺少一般意義上較為連貫、通俗易懂且吸引眼球的歷史故事情節，取而代之的是十分簡略的事實陳述和較為抽象的數據、圖表。這樣，似乎只有那些具有較高理論素養和較多歷史知識的人，才會對本書有強烈興趣並有能力讀懂它。換言之，儘管魏昂德已經努力嘗試使本書通俗化，但它依然是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

本書的參考文獻共涉及三百六十多種書籍和論文，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英文著述。這固然反映了中國大陸相關研究的嚴重滯後以及國際影響的微弱，同時也說明作者對中國大陸學界的情況還缺乏足夠了解。

註釋

① 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Nanjing'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03 (September 2010): 675-92; "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onflict in Nanjing", *The China Journal*, no. 65 (January 2011): 1-25; "Local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anjing under Military Contro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0, no. 2 (2011): 425-47; "From Truce to Dictatorship: Creating a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in Jiangsu", *The China Journal*, no. 68 (July 2012): 1-31; "Nanjing's 'Second Cultural Revolution' of 1974",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12 (December 2012): 893-918; "Foreshocks: Local Origins of Nanjing's Qingming Demonstrations of 1976",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20 (December 2014): 1092-1110.

③ 參見 Andrew G. Walder, *Chang Ch'un-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Ann Arbor, M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8); *Fractured Rebellion*; "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 1966-1971",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8, issue 3-4 (2014): 513-39。

④ 參見 Dong Guoqiang, "The First Uprising of Cultural Revolution at Nanjing University",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2, no. 3 (2010): 30-49; 以及註②中董國強與魏昂德合著的論文。

⑤ 關於北京精英政治的敘述，作者主要借鑒馬若德等人的《文

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vols.)、《毛澤東最後的革命》、泰偉斯與孫萬國的《中國通往災難之路》、《林彪的悲劇》(*The Tragedy of Lin Biao*)、《毛主義時代的終結》、以及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時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等。

⑥ Jean C. Oi,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elfare Regimes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Geneva: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2008), [www.unrisd.org/80256B3C005BB128/%28httpAuxPages%29/C2CFD1D794298744C125765D003A2B26/\\$file/Chinaweb.pdf](http://www.unrisd.org/80256B3C005BB128/%28httpAuxPages%29/C2CFD1D794298744C125765D003A2B26/$file/Chinaweb.pdf), 3.

⑦ 參見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⑧ 參見 Andrew G. Walder, "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 1966-1971", 533-34。

⑨ 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中國知識份子》(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徐海亮：《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2010)。